

Kangyouwei Zhuan



康有为 传

纪能文 罗思东 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



康有为传

Kangyouwei's Dream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海涛

装帧设计:丁明

《康有为传》

纪能文 罗思东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381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合肥永青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30千

版次: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555-5/K·451

定价:15.00元

印数:00001-06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西樵异人	(1)
延香老屋里走出来的“圣人”	(1)
名师朱次琦	(7)
西樵山的隐客	(15)
“米”字旗下的新世界	(20)
不裹足会的风波	(27)
第二章 经家野狐	(34)
起死回生的“西学”	(34)
不达圣听的上书	(40)
万木草堂的师生们	(51)
不许出台的《新学伪经考》	(58)
《孔子改制考》	(67)
“公车上书”	(73)
第三章 百日维新	(81)
工部主事·《万国公报》·强学会	(81)
被下了逐客令的“上宾”	(90)
从《知新报》到“圣学会”	(98)
西花厅里的群英会	(106)
勤政殿里的召见	(116)

一百零三天的维新	(123)
第四章 流亡岁月	(133)
重庆轮上的特殊客人	(133)
冰炭难投的同命人	(142)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151)
愿打头阵的唐才常	(159)
“背负儒家十字架游世界”的人	(167)
第五章 “不许革命”	(173)
“十三太保”	(173)
大师与大师的较量	(181)
回光返照的“预备立宪”	(188)
昙花一现的“帝国宪政会”	(193)
斗不倒的对手	(200)
第六章 魂系君宪	(205)
革命大潮中的“救亡”	(205)
不忍匿藏的“良方”	(212)
不合时宜的孔教会长	(218)
第一弟子和他的几个响头	(226)
短命的“弼德院副院长”	(232)
第七章 天游化人	(244)
“屁股向后的拉车夫”	(244)
在美森院的日子里	(250)
不甘寂寞的“圣人”	(257)
“秀才将军”的高参	(266)
最后的孤臣	(275)

第八章 大同之梦	(283)
最后的祭奠	(283)
《大同书》留下的话题	(288)

第一章 西樵异人

延香老屋里走出来的“圣人”

1858年3月19日(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

康有为诞生于广东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一名苏村)。

这是坐落在珠江三角洲南部毗连广州的一个美丽的城郊小县,地接佛山,清幽宁静,物产丰饶,风景秀丽。南宋年间,康有为祖父康建元率族自南雄珠玑里始迁于此,从此聚族而居,生息繁衍,至康有为已历二十九世。人丁兴旺,再加上屡屡的仕宦,到了康有为这一代,康家已成了南海一带令人称羨的大家族了。

当然,最值得康有为夸耀的还是这个家族书香继世的族史,他自称:“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凡为世人十三世矣。”(《康南海自编年谱》)一个家族能历十三代而操无别业,靠书香传家的确是很难得的。不过,细究康有为的家世,直到19世纪以前,康家的确既没有什么显赫的达官,也未出过著名的学者。因此被康有为所列举的值得称道的先人也仅仅都是些“雄才博学”、“诗文卓越”、“严气正性”、“考德仁厚”之类循规蹈矩、能诗能画的下层读书人。即使被康有为极端推崇的祖父“连州公”康赞修也只是一介举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钦州学政”——一个掌握地方教育的下级官吏。

到了道咸年间，终于使这个家族朱紫盈门的是康有为的叔祖公康国器，他曾官至广西布政使，升护理巡抚，不过，他靠的却不是读书，而是军功，依靠自己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统兵万人，克名城十余”的赫赫战功，所以，大概说来，康家除在康国器之后出了一些靠军功入仕的下层官吏之外，其余大都是些以读书为乐、以教书为生的士子，即使做官，也大不了是教谕、学政之类掌握地方教育的小官。所以康有为自称：“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应该说还是言之不爽的（据康有为“康氏家庙碑”统计，自其先祖文耀公后的70个后裔中，仅11人为士人，70人中之14人系文官或武官，由军职而入仕，9人在政府中任职，但无科名。因此，自文耀至有为历五世，十七世至二十一世，学者仅占康氏家族少数）。康有为的父亲，康赞修的幺公子康达初，早年随乃叔康国器出征太平军，戎马五年，原本可以依靠军功，做一个补用知县，无奈天不假人，在即将赴任时偏偏喘病大发，没法受命，也就只好“授徒于乡”，由七品衔的知县屈就了一个“教书匠”了。——这就是康有为后来所称的“知县公”。

康有为排行第三，却是他母亲产下的第一个男婴。因此，他的降生给这个大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康有为的祖父，时任钦州学政的康赞修“闻而欣喜”，当即以地为名，赐其名曰“有钦”，并赋诗七律一首：

久切孙谋望眼穿，震雷未发巽风先。

漫将璋瓦猜三索，忽报桑弧划一乾。

画省孤灯花独冷，书香再世汝应延。

可怜大母含朝露，空话含怡慰九泉。

康赞修的赐名因邮传濡滞没能迅速送达南海银塘，只好由和他一样也“久切孙谋”的大伯祖父康学修给孙子起了个“有为”的名字。但从他的这首《闻长孙有钦生》里，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的降生与其说给这个家族带来的是添丁之喜，不如说是给他的先辈们带来了书香延世的希望——正是肩负着这种期望，在康有为的童

年时代里,始终得到各位祖叔父格外的垂爱和严厉的督促。提携教誨,延師課導,良好的受教環境和嚴格的家傳學風,無疑為康有為日後的治學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础。

特別的天資和稟賦使康有為成了這個家族祖叔父們特別的“寵兒”。按他自己的記述,4歲時,他“已有知識”,5歲已經“能誦唐詩數百首”,在一個四五歲的孩子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不同凡響的悟性,自然樂壞了康有為的先輩們,各位祖父,包括他的外祖父“省閩公”勞以迪在內,對他都是“愛而教之”,耳提面命,他們都在剛剛垂髫的康有為的身上辛勤地種植著自己的希望,對其“期以將來大器矣”,康有為誕生的老屋因此被命名為“延香老屋”。

對於童年時代過人的聰穎,大概就連康有為自己也是頗為自得的,因此,即使在幾十年後的回憶中仍然津津樂道自己孩提時代的傑作:6歲那年,康有為剛剛啟蒙,家裡為他請來了番禺簡侶琴(風儀)先生教讀《大學》、《中庸》、《論語》并朱注《孝經》。一日,諸父課以屬對,出上聯“柳成絮”,康有為不假思索,脫口答以“魚化龍”,應答敏捷,而且意境不俗,直樂得他那做教諭的伯父“彝仲公”康達棻眼睛眯成了一條縫,稱贊“此子非池中之物”,當即賞給紙筆(《康南海自編年譜》)。

在康有為童年的家學淵源中,受益最多的恐怕還是來自他的祖父——“連州公”康贊修。在康有為的記憶中,這位終身以教育為業的祖父始終是一位學識淵博而又純正質樸、督促嚴格而又不失和藹可親的慈祥老人。康有為8歲那年,這位祖父以欽州學正俸滿。改教授回鄉候缺,並在廣府學宮孝悌祠設館,招徒授經,兼修縣志。康有為這時正從伯父康達棻啟蒙,學舍就在孝悌祠後面,因而有機會可以常常“侍連州公館中”,找祖父“趨庭訓”。所以,這一時期的康有為雖然也換過幾位蒙師,但接觸最多,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他的祖父。康贊修愛好游觀,每逢春秋佳日,常常杖履而游。西樵山、鎮海樓、五羊觀、蒲澗寺,無論走到哪里,他總是帶上自己的

宝贝孙子。这位忘孙成龙的老学究尽一切可能抓住每个机会对康有为“授以诗文，教以道义”。在康有为看来，虽然是同样的东西，在祖父讲起来，不知要比学堂里那些摇头晃脑哼吼着“人之初，性本善”的老学究讲的要好懂得多少倍呢！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之中，康有为在一步步地扩展着对这个世界的见识。同治七年，康有为恰好11岁，他的父亲“知县公”康达初因病辞世，而在此前1年，祖父因借补训导之任，重返连州，因此在丧礼3月后，失去父亲的康有为只好奔赴连州，“从先祖公于连州舍馆”，过起了祖孙相伴的日子。

这是康有为启蒙生涯中一段极其重要的时期，在康赞修的督促和辅导下，康有为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经史文学、儒家经典的学习，“连州公日夜传导以先儒高义、文学条理，始观《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遂读《明史》、《三国志》”（《康南海自编年谱》）。应该说，这样的教学内容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还是很有难度的，为着诗书继世的夙愿，年迈的康赞修在孙子身上倾注了无限的心血。在连州学馆的日子里，康有为的读书生活是相当刻苦的，白天他竟日苦读，每当日薄西山，室内昏暗，他便拿着书卷来到檐下，倚柱就光；每当深夜，总是“务尽卷帙”，祖父强迫他上床睡觉，他便将灯光挑小，伴着如豆的昏灯，在帐中“隐而读书”。康有为以其过人的好学和聪敏，在学业上有着长足的长进，跟着祖父6个月以后，“为诗文皆成篇”，这自然是令人振奋的成就。在连州的第二年，适逢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12岁的康有为当场赋诗“二十韵”，惊得州吏“目金公”连呼神童，赠给“漆砚盘盒数事”。这自然也给年幼的康有为带来了不少名气。祖父也尽一切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一面率康有为游诸名胜，一面随时随地地向他灌输“圣贤之学，先正之风”。大凡连州的胜地，不但留下他们祖孙的足迹，也留下了幼年康有为无数的诗篇。

同治九年七月，也就是康有为13岁那年，康赞修应广东布政

使王凯撤调，还广州办理地方治安，康有为随祖返乡，于是结束了连州学馆的生涯，重新回到了母亲和叔父们的身边。

一年多的连州学舍的生活给康有为童年打下深深的烙印，祖父康赞修的谆谆教诲不但为日后康有为的旧学功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祖孙二人结下了难分难解的深情。1877年（光绪三年）的5月，也就是康有为20岁那年，正在连州训导任上的康赞修驾舟救灾，不幸以身殉职。时值康有为正在老家礼山草堂从学于朱次琦先生，消息传来，他“闻而哀毁，三日水浆不入口，百日内食盐菜”。康赞修临时停柩于老家象冈，康有为就伴随着各位叔伯，“结苦棺前，白衣缞经不去身，不肉食”，就这样，一直守到康赞修落葬。直至30年后，康有为仍然深深地思念着他那亲侍10余年，耳提面命，饮食教诲的祖父，在《连州遗集》的序文里，康有为饱含深情地写道：

……有为自髫卯含识，即侍先祖连州府居，几席衽趾，杖履游观，无不从焉。垂及冠年，日闻其古先贤之微言大意，日德古豪杰之壮节高行，浸之饫之，泳之游之，皆连州府君之庭训也……

其实，在科举和未来的出路问题上，康有为的叔伯们和他的祖父一样的急切和热衷。对于他们来说，从读书到科举再到入仕以致显身扬名光宗耀祖，不但是几千年来读书人亘古不变必须重复的人生轨迹，而且也是读书人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他们看来，读经应试不但是男人与身俱来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八股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因为，它关系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前途和出路，而且也是和整个家族的荣誉和兴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从一开始就成为这个家族的宠儿，从很大的程度上与其说是出于血缘的天性，不如说是他们从康有为过人的聪明上看到了与此相联的整个家族未来的希望。即使他的祖父康赞修也不例外。

康有为自连州一回到老家，立即被赶到广州城西门外第三甫桃源，跟随陈俸生先生读书，后来又被先后送到灵洲山之象台乡，师从杨云山先生，返银塘乡跟随张贲臣先生。当然学习的内容都是康有为讨厌十分的八股文。同治十一年，即康有为15岁那年，“当他第二次应童子试不售”时，诸叔父们立即抓紧了对他的督促，“于是督责为八股小题文”——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他的叔父康达节一直亲自担任着康有为的导师，负责侄儿的学业。

以康有为少年时代的天资和聪悟，他的功名道路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然而事实上，他的应试生涯是极其坎坷的。从14岁起，他就屡屡地“应童子试不售”，以至终他一生都没有拿到过科举考试的第一级证书“秀才”，最后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只能借助祖父因公殉职的荫庇，凭着一个荫监生的资格，他一生六次应乡试，有五次名落孙山。等到光绪十九年，他终于不负举家厚望拿到举人的头衔时，已经36岁，真可谓是“大器晚成”了。

应该说，康有为还是有着相当扎实的八股功底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时为制艺文，援笔辄成”，只不过是“但不好为之，不工也”。显然，问题只是出在他对于应试的态度上，为此，返回银塘乡以后，康有为受到了叔父们的严厉督责。在对康有为的一番“极责”之后，他们还将康有为拉到了康赞修的面前“大责之”，并当场出“君子有九思，至忿思难”一题。多亏了自己的小聪明，康有为援笔为十六小讲，各有警句，才逃过“连州公”的一关。但从此祖父也在八股上加强了对他的约束。当时祖父正在五羊城书院做院监，康有为被带入城，跟从吕拔湖先生学文，从此“事事八股，一切学皆舍去”矣，只有偶尔回家的时候，康有为才能随心所欲地涉猎自己喜爱的“群书”。

在他的老家，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读书条件，叔祖父康国熹——靠平定南海及邻近三县的军功受知于左宗棠，这位“懿修公”虽非学者，但却藏书万卷于澹如楼，康有为因此得以自小涉猎，后

来自谓“得博群籍，赖公书”。1865年（同治四年），叔祖父康国器，新授福建按察史，辞职返乡，大兴园林，又在康家原来藏书楼的对面新建了一座书楼——二万卷书楼，内藏书数万册。在这里，不但皮藏着卷帙浩繁的经集杂史，就连《瀛环志略》这一类新版图书康有为也是在自己家里读到的，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丰富的藏书为康有为的人生铺出了一条宽阔的路。

然而，功名富贵和康有为酷爱的“纵横之文”毕竟不是一股道上的东西。康有为在经史考据上下的“苦功”终究没解决诸叔父们长期以来寄托在他身上最大的希望，当19岁（光绪二年）康有为乡试再度落第时，家里的诸叔父们又紧张起来，他们在寻觅着，希望能找到一位为康有为的仕途指点迷津的新救星。

名师朱次琦

就在这时，朱次琦闯进了康有为的生活并成了他的导师。

这一年是1876年（光绪二年），康有为参加乡试名落孙山。于是“愤学业之无成”，在祖父的介绍下，转投到了朱次琦的门下。

朱次琦（1807—1881年）字浩虔，一字子襄，号稚圭。南海九江人，因此，人称九江先生。这位道光年间的进士曾在咸丰年间做过几十天的山西襄陵知县。他不但是连州公康赞修的老友，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和他那几位学问很不错的叔父康达棻、康达节等人也都出自朱先生的门下。当时，朱次琦正设馆讲学于礼山草堂，其地距银塘不远。当康赞修将这位屡试不第的孙子再次托付给他的老朋友时，自然也将这个家族书香延世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名师宿儒身上了。康有为在礼山草堂正式拜师受教，就算是开始了他一生中新的求学生涯。

朱先生是位做义理之学的大师，其学所涉十分广泛，在经史掌故、考据辞章各个方面都有着独树一帜的研究，在晚清学界，也算

得上是一位数得着的人物，因此，在他的礼山草堂里所开的课程也是十分庞杂，老先生把自己的学问概括成“四行五学”。

所谓四行，就是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文学、掌故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从内容上看：礼山草堂的教学仍无非是传统的修身立业、道德文章之类的儒学的东西，然而，正是在这种传统的东西里，朱次琦糅合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他一扫汉宋经学的门户隔阂，而将经史两学相互贯通，互相印证，特别是他的掌故之学涉及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水利、文物制度等各个方面。

读书不再以八股制艺为归依，而将圣贤之学与修身治国联系在一起。这自然令长期以来一直奉朱注六经为金科玉律，以破承束股为不变格式，以代圣人立言为唯一使命的青年人耳目一新。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赶到礼山草堂，拜朱次琦为师。就这样，朱次琦以“荐授五品卿”的身分，30年累召不出，在礼山草堂里，以讲学躬行，“色笑教人，亹亹忘倦”，直到光绪八年，老死在这片幽静雅致的园林学舍里。

年轻的康有为踏上了他求学人生的一个新台阶。经过一番简单的拜师仪式之后，他成了礼山草堂入室弟子，也从此开始了艰苦的读书生活。三年礼山草堂的学习，对于康有为日后的治学和政治生涯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朱次琦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向孤高自傲，动辄“希古人”的康有为终于被这位慈祥而又威仪严肃的老人深深地折服了。他在后来描绘自己初次受教于朱次琦的感觉时曾自称：

于时捧身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必为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以前必为可读，以一身为必能可立，以天下为必有可为。

拜师朱次琦，改变了康有为的读书方向，自入草堂后，他即谢绝科举制艺、士芥功名之事，改读宋儒之书及各家经学，乃至小学、

史学、掌故辞章之类的东西。

礼山草堂别具一格的教学和朱次琦先生的博学强识，深深地吸引了康有为和他的同学们，和那些每天总是夹着厚厚书本一开始就摇头晃脑念书，然后再让学生摇头晃脑背书的教书先生不同的是，朱次琦先生上课从不带书本，也不要什么讲义，只要开启了话题，便能贯穿朗诵，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一旦涉及到“大节所关，名节所系”的地方，老先生总会热血沸腾，神情激奋，词句铿锵。以至气盛脸红，声震屋瓦，让听课的人莫不悚然。

从后来的回忆看，在师从朱次琦的岁月里，最让康有为折服的大概还是这样两样东西，一是先生的学问主张济人扶世，一变宋明以来性理之学的连篇废话空话；再者便是先生的道德和涵养。在康有为的眼里，朱次琦在这一方面已远远地超过了前朝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在康有为后来的回忆中，我们随处可见他对于这位恩师的无限深情的溢美和回忆：

……先生硕德高行，博极群书，其品诣学识，在涑水、东莱之间，与国朝亭林、船山（即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王夫之——引者注）为近，而德器过之。

……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汙，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高低空谈……先生动止有法，进退有度，强记博闻，每忆一事，论一学，贯穿古今，能举其词，发先圣大道之体，举修己爱人之意，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南海自编年谱》）

自清代以来，随着自康乾两朝对于文化人采取的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兴起，学术便走上了两途：一条是应试之学，靠几篇八股制艺，背几年朱注六经，只要逢上仕途好运，只要不离经越轨，便能领上一条通往官场的通行证，从此只要多磕头，少说话，便能保证你一生的受用和一生的荣华；另一条路便是远离政治，康乾以后的读书人再也没有勇气和胆量像明的遗臣顾炎武（亭林）、黄宗羲那

样纵横古今，放论国是，鼓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于是他们便捡起跟谁也不相干，谁也挑不出茬的词章、考据和训诂之学。大凡康乾以来数得着的学者莫不是靠着这个行当出名。学问也就从此走向了复古、繁琐和脱离实际。

到了嘉道以后，大清国已在中原立国 200 年，康熙乾隆的子孙们再也没有必要为了“清风不识字”之类子虚乌有的东西随便再摘去读书人的脑袋。而国势的衰落，吏治的腐败和民生的艰难，再度激发了一向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文人学士们重振“经世致用”的热情。复兴的顾黄之学涉及着纾解民困、匡时济世的各项实务，大凡学术、政治、经济及至海防夷务无不包罗，其内容博大恢宏，丰富多采，从而成为大清王朝衰敝陵夷之际一股独特的社会潮流。

从流派上看，朱次琦所做的学问应该属于当时这股经世大思潮中的“学术经世”。其核心就是重整圣贤之学，匡扶名教，齐肃人心风俗。日后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而归宗孔子，作《孔子改制考》而为维新张本，横扫东汉以来被经学家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古文经典，在晚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以其非圣无法被斥为经家野狐禅，他的不苛世俗、离经叛道的勇气和有关真伪“经”的念头实际上在礼山草堂朱次琦那里便深深地奠定了根基。他自己也承认，在礼山草堂里，当听到朱次琦的“大道之传”以后，便决意认为“圣人可学”，“而尽弃伪学，自此始也”。至于这里何谓“圣贤之学”，何谓“伪学”，我们只要看看后来他作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一目了然了。

同样是程朱陆王传下来的心性性理之学，在朱次琦这里已不再是天理人欲之类的高谈阔论，而变成了“济人经世”的学问，这自然对上了一向志大妄狂的康有为的胃口。朱次琦给他的入学试题是《五代史史裁论》，这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和以往的八股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但是，对于涉猎广泛、读书杂博的康有为来说，这却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康有为查阅群书，仿史通体裁，很快交上

了洋洋洒洒足有 20 余页的论文。朱次琦仔细地看完了康有为的作业，这位新来的年轻人锋芒毕露的才华和极其广泛的知识面引起了他的极大的兴趣，在康有为的作业上，这位老先生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他的只有四个大字的评语“赅博雅治”。

这是康有为有生以来著的第一部“书”。著书立说原来竟是这样的容易，原以为渺不可测的古人原来就在你的手边，从前在老家七桧园里读的那些杂七杂八的玩艺，原来却都是有用的东西，朱次琦的评语无疑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和自信，也引起了他在礼山草堂读书的无限兴趣和热情。在礼山草堂的日子是他读书最为勤奋的一段时间。每天东方未白，他便早早地起床，直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丢下书本熄灯就寝。礼山草堂所设的课程十分广泛，这一时期，从宋儒之书到各家经说，从小学、史学到掌故词案，他都“兼综而并鹜”，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每天的读书可以寸记。入学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就遍读过《赵辛楣全集》、《廿二史札记》、《日知录》及《困学记闻》等大量的大部头著作。在家的日子里，他读的书不少，但大多支零破碎，不得要领，如今一经先生的讲解提挈，同学之间的上下议论，不但过去的很多疑问都涣然冰释，而且过去那些“杂博之学”也渐渐地能够贯串起来，相互融通了。

礼山草堂里的苦读为康有为打下了极为扎实的旧学功底，为此，他常常感到很幸运，“倘非生近其时，居近其地，我怎能碰得上这位使我受益无穷的导师呢！”他常想。所以在礼山草堂师从于朱次琦的日子里，康有为始终以最大的热情尽可能地抓住一切时间“肆力于群书”，将自己埋到这些诗书经义的故纸堆中。虽然礼山草堂离他家并不远，但是在他的记忆里，在 3 年的读书时间里他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祖父的去世。为了报答这位 10 年亲侍的老人，他和诸叔父们一起结苦守灵，从那一年的 7 月直到年底。还有一次就是回家娶媳妇。

和任何门派的师承关系一样，康有为的读书在很大程度上受